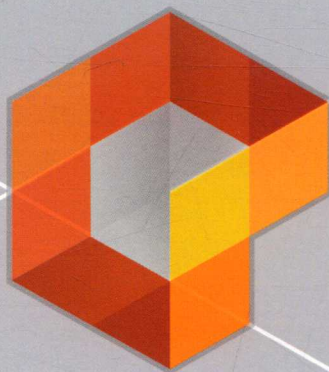




外研社翻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数字化时代的翻译

(爱尔兰) Michael Cronin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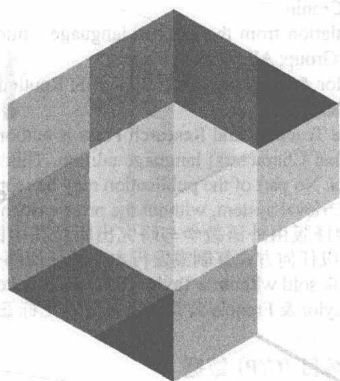
朱波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外研社翻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数字化时代的翻译

(爱尔兰) Michael Cronin 著

朱波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京权图字：01-2017-7431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by Michael Cronin / ISBN: 978-0-415-60860-2

© 2013 Michael Croni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的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数字化时代的翻译：汉、英 / (爱尔兰) 迈克尔·克罗宁 (Michael Cronin) 著；朱波译.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10

(外研社翻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ISBN 978-7-5135-9526-1

I. ①数… II. ①迈… ②朱… III. ①翻译—研究—汉、英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4249 号

出 版 人 徐建忠
项目负责 王丛琪
责任编辑 毕 争
责任校对 王丛琪 张丽娟 蔡 喆
封面设计 彩奇风
版式设计 吴德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1.5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526-1
定 价 42.9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95260001

致 谢

在一个虚拟形象主导的时代，人们容易忽视现实世界的重要性。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会得到并受益于同事和朋友的诸多支持与帮助，本书也不例外。翻译与文本研究中心的同事和研究生不断激励我，启发我，加深了我对书中主要问题的理解。多年来，应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院这一多语言与多文化环境滋养了我，它是反思全球化存在的最佳场点。在此，我要感谢院长艾琳·皮尔森-伊文斯博士和都柏林城市大学，准许我在2011到2012学年期间休假，专注于写作这项工作。感谢我的朋友，你们的谈话与见解挑战了我的偏见，特别是加文·迪特里、卡明芬·奥克罗迪恩、彼得·斯尔、芭拉·奥希弗达、埃维琳·康隆、克劳德·阿克布莱纳和迈克尔·卡宁汉姆，是你们早在15年前就让我觉察到数字世界令人震惊的新景象。还有我的儿子麦迪宁，一个来自数字世界的原住民，感谢你不断不厌其烦地回答父亲一个又一个问题。

显然，翻译是一种联结本地与全球的行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给我带来了诸多建议与意见。下列地方的同事为我提供了试验和探索的空间，帮助我实现最初设想。在此，我想对巴纳德学院（美国纽约）、爱尔兰研究中心（比利时鲁汶）、耶鲁大学（美国纽黑文）、美国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埃及开罗）、法国作家协会（法国巴黎）、釜山国立大学（韩国）、华威大学（英国）、洪堡大学（德国柏林）、赫尔辛基大学（芬兰）、立教大学（日本东京）、肯特大学（英国）和格但斯克大学（波兰）等学校或机构表示由衷感谢！

我还要感谢劳特利奇出版社编辑团队，特别是路易莎·赛姆林和苏菲·雅克，你们的爱心与耐心最终成就了本书，让其得以付梓。

最后，我要表达对菲奥诺拉·马克·奥德哈的感激，感谢她在写作过程中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这种感情很难用言语表达。她长时间陪伴在我身边，用真情与智慧激发我在文字间穿行。如果说这本书开启了翻译与翻译研究的新路径，从某种程度上要感谢我的女儿拉瑟菲奥娜，她的到来点燃了灵感。把书献给菲奥诺拉和拉瑟菲奥娜，我最心爱的人。

要 点

(1)

信息技术的核心是可转化性或可译性，把声音、图像、文本等信息翻译成二进制代码。因此，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信息社会就是翻译时代、翻译技术、翻译社会。

(2)

可译性让翻译成为最佳立足点，使得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审视语言、文化和社会在可转换性机制下所经历的一切，并反思这种可转换性出现阻碍或遭遇极限时的景象。

引言

翻译时代

我睁开双眼，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没什么奇怪的——人生过半，这种感觉不时出现，但这次不一样。

困惑愈发令人恐惧，愈发令人感到无所适从。(Agassi¹ 2010: 3)

安德烈·阿加西在纽约一家酒店的套房里醒来，他来此间是为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这不仅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美网，也是他最后一次职业赛事。由于身体状况和个人事务等多种原因，他不得不在36岁这年选择退役。身处这个时代的翻译工作者，不论其翻译水平如何，一定都会和阿加西有相似的困惑。在线翻译无处不在；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翻译应用程序不断普及；大型翻译项目日趋自动化；阅读从纸质转向屏幕，让读写实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时电子通讯要求受众时刻在线²并及时回复；不断变化的数字翻译工具，比如翻译记忆软件——这一切都导致了“这次不一样的感受”。之前可能有过一些变化，但这一次“困惑愈发令人恐惧，愈发令人感到无所适从”。

本书对这种困惑展开探讨。过去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讲学时，经常遇到听众问一些相似的问题：翻译工作者有没有未来？在“谷歌翻译”年代，人工翻译是否注定大规模消失，或变成一种古雅的、仅供人们周日消遣的无关紧要的活动？当今世界，翻译需求量飞速增长，是否仍需要人工来满足，还是由机器代劳？

这些问题表达出一种感受，即翻译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剧变；我认为这种感受确有道理。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给翻译带来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这些

1 Andre Agassi, 1970-, 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先后8次赢得大满贯赛事冠军，于200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后退役。

2 24/7，指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昼夜不停、全年无休的工作模式。

影响不再局限于以住的极客¹秘密会议，或评估最新推出的软件，或一本正经地列举机器翻译的可笑错误。学生、学者，事实上任何对人类文化和语言感兴趣的人，都应该仔细观察翻译在数字时代发生的变化。

本书是一部阐释之作，而非预言。在一个技术创新源源不断的领域，针对可译性问题和困惑来预测自动化体系最终能否成功，将会愚蠢至极。本书旨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翻译技术对语言、文化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本书采用从人类学到动物学的学科视角，探讨了一些历史案例，内容涉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边古人类定居点，以及当代世界中诸如澳大利亚军方不断变化的命运。从始至终，本书都尽力避免对证据的无意义分割，把文学翻译与技术、商务和科学翻译结合起来探讨。书中反复强调，技术并非单纯是一个配件，或翻译的附属品，相反，它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直至当代对翻译活动的定位都是至关重要的。

专攻欧洲文艺复兴的著名历史学家弗朗西斯·耶茨²，对前进运动受制于过往回忆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有过评论：

文艺复兴中所有伟大的前进运动都从回顾往昔中获得活力与情感冲动。从最初充满纯洁与真理的黄金时代到随后的铜器与铁器时代，把时间视为不间断、永久运动的周期性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对真理的追寻必然成为一种对早期的、古代的、最初的“黄金”的寻求，而现在或不久之前的“不纯正金属”只是其堕落的退化。(Yates 2002: 1)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研究数字时代的翻译，都会面临所谓“向后看”和“向前看”的双重危险。前者是一种诱惑，诱使我们把数字化看成翻译无法挽回的境地。在翻译最初的黄金年代，译者知道如何拼写，他们阅读图书，他们能在一页书上集中注意力达五秒以上，他们也可以在不掏出智能手机的情况下报出美国50个州的名字。后者是一种同样强烈的诱惑，把数字

1 Geek, 指智力超群, 善于钻研, 但不懂与人交往的怪才。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兴起, 又指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有狂热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的人。

2 Frances Yates, 1899-1981, 英国史学家, 在伦敦大学沃伯格研究院 (Warburg Institute) 执教多年。

化现状看成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惊奇的世界，以激动人心的公司文体“……难道不令人惊叹吗？”来叙述一切。在计算机信徒令人激动的夸张中，自动化翻译意味着所有冲突、悲伤与痛苦的终结，人类得以在更高层次、相互理解的状态中实现联结。

通过审视如今翻译界所发生的一切，《数字化时代的翻译》力图避免宿命的悲观主义和愚蠢的乐观主义的双重危险。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论断，向任何一位当代文化和社会专业学生指出了翻译更为广泛的重要性：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信息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社会，被称为“翻译时代”更为恰当。数字工具的极度灵活性意味着它们可以生成各式各样的产品。只要配上合适的软件并接入网络，最简单的笔记本电脑就能发挥档案管理、会计、游戏机、图书馆、影集、房产经纪人等多种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二进制代码让计算机输出的多变性成为可能，文字、图像和声音都可以转换成代码这一通用语言。这样一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在生活各个领域出现的巨大变化都可以被纳入可转换性或翻译这一标志之下。恰恰是这些位于数字革命中心的可转换物的变性或变形效果，让翻译成为最佳立足点，使得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审视语言、文化和社会在先进的可转换性机制下所发生的一切，并理解这种可转换性出现中断或达到极限时的情景。

第1章开始就把翻译的数字化进程置入人与工具互动的漫长物质史之中。我们认为，人性与工具所提供的可能性并无二致；正是这些可能性定义了人性。然而，承认工具的中心作用，并不意味着推崇技术决定论这一削弱人类作用的理论。本章接着探讨了亲属关系安排的重要性，因为它使人类社区之间有了翻译的可能性；通过“蕴涵”这一概念，论证了社会与组织基础设施对物质文化繁荣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化不断面临如何克服距离、处理各种翻译关系的挑战。通过古代和中世纪后期的实例，本章揭示出接近伦理在翻译中的显现，作为一种应对由扩张导致的空间与文化后果的尝试。本章的中心内容是对“3T”范式的详细阐述，具体为贸易 (trade)、技术 (technology) 与翻译 (translation)。通过探寻早期城市文化的演化，本章提出上述三要素与城市文化发展过程密不可分，任何文化平衡发展的历史都要把三要素的密切互动考虑在内。三者的交互至关重要，因为排除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做法势必造成特定文化的孤

立主义或排他主义解读。文化与社会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问题。本章聚焦古罗马，探索了技术与商业发展引发的针对语言的强烈文化焦虑。更普遍的说，这些焦虑与一种新媒体带来的无法预见的结果有关。在此，我们重新考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¹“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因为它可能引发我们思考翻译的物质史。接下来，我们以16世纪的英格兰为例，探索了翻译与日益显现的印刷机知识伦理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媒介，印刷机深刻塑造了翻译信息。以19世纪爱尔兰翻译家珍·王尔德夫人²为例，我们探讨了印刷技术如何不断塑造翻译的命运这一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王尔德的翻译为日益显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想象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其他地方很多相似的运动一样，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通过印刷机的支持得以存续。在结尾部分，本章思考了空间或时间如何在不同探索时期被尊为理解人类经验的方式，以及二者如何不断遭到翻译和物质文化的挑战。

第2章着重介绍了数字化时代的语言、权力与翻译等问题。在翻译自动化进程中，最显著的趋势就是受控语言的产生。跟随受控语言之后的是生成一种简单化、容易理解的全球英语规划。本章讨论了这些发展的内涵，指出了因超国家层面或全球通用语发展而经常导致的矛盾且不可预测的结果。与此同时，受控语言与全球英语被置入英语的清教徒式翻译中，后者与简明表达概念密切相连。在某些时候，简单表达的代价并不十分明显。在探究围绕翻译争论中的成本概念时，本章提出隐藏或转移的成本掩盖了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本质，这种关系深深嵌入翻译与技术的相互作用之中。而这种相互作用日益与去中介化交织到一起。本章探索了在线翻译系统的出现对翻译通俗概念产生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使用纯工具性术语来表达思想，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信息从一点传到另一点。我们还探讨了这种工具主义对科学的影响，并通过这一研究挑战了数字化时代中围绕科学交流的一些陈词滥调。如果语言的工具观得以盛行，那便与及物性的兴起这一更为宽泛的文化模式有关。及物性赋予每项活动

1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传播学家、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一代宗师，以“地球村”和“媒介即信息”等观点名震全球。

2 Lady Jane Wilde, 1821-1896, 爱尔兰诗人、作家、翻译家，年轻时参与反抗英国压制的运动，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母亲。

一个明确的、预先设计的目标，这一点对翻译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初学者期待找到一种唯一正确的方法，或是翻译业界对一致性和标准化输出的坚持，都显示出对及物性的明确期待。本章还探讨了文艺复兴翻译史的一个片段，以及有关用户与翻译技术互动的情况，并藉此提出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结果来看，翻译在很多方面根本不是及物性的。

在数字化时代，坚定的及物性或功利主义翻译观的一个强大盟友就是透明性思想：所见即所得；只要你能看见，就能得到它。在探讨透明性思想在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运动和20世纪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哲学根源时，本章思考了这一思想对当代翻译带来的影响。我们特别关注了理解透明度的方式——透明性引起了不透明性——解释了数字技术对语言多样性增长的贡献。当然，潜在的不透明性的一个领域在于经济利益在新数字经济中的真正本质，以及译者施行积极或消极代理的程度。代理这一问题被置入数字著作权与数字互动的区别之中，本章呼吁在任何显现的翻译伦理中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数字自反性。

第3章关注翻译在数字化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本章所述的“救世”翻译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构建一个基于翻译的无边界世界。在数字工具的强力支持下，翻译消除了界限，废除了边境，迈入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全新世界。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救世”理论不仅歪曲了冷酷无情的政治现实，而且也未能充分展现译者在当前以及过去所做的工作。从人类学和哲学角度入手，本章引入了限度这一概念，把它作为一种方式，来确立译者如何通过限度的内部与外部体验来构成具体的翻译方法，接着探讨了这些体验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语言与文化的整体体验。在讨论限度概念时，本章还提出翻译对指向产品、服务与理念无限增加的广延文化带来挑战，应当对翻译所置入的精细文化，一种不对等文化的不同方式给予更多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精细文化源于一种对限度的生态关注，尤其是增长的限度，但它也与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翻译概念有关，即同一性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作者身份关注作者意图如实得以展现，而这也促成了个性化建筑的出现。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出现促使同一性概念日益盛行，导致人们认为只有一模一样才真实可靠：从纸币的可接受性（伪币设法造得一样，但却不是）到T型车的可销售性（因为一样，所以可靠）都是如此。本章回顾了20世纪针对英语文学翻译不断变化的理解过程，探讨了翻译中同一性语义机制不断变化的命运。从这一历史角度，不可避免地显现

出可变性这一范式，这一范式与数字再生产时代中的翻译工作相关。数字再生产让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得到无尽复制。数字产品是围绕可变性（而非同一性）而构建。本章思考了数字产品这些新形式对翻译的影响，以及它们怎样与基于广延文化的模式关联或不关联。针对翻译到底是亲笔行为还是代书行为，前者主要是由制造者或工匠完成的工作，后者通常是由其他人完成且不被承认的工作，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4章探索了数字技术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本章细述了一家主要翻译供应商在经营中的内在逻辑，展现了翻译生产和管理过程中本地交付和中央控制之间不断出现的张力。在数字化时代，新翻译经济的主要关切在于总量、时间与成本。我们分别考察了在自动化与半自动化条件下这三个要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关注翻译活动特定形式的发展动向，尤其是全球范围内存在获取信息技术服务的多种不同层次，促成了新的本地化方式的出现。我们从总体上的地缘政治张力与企业战略角度对此加以分析。全球翻译供应商和本地方案提供了大批量翻译，促成了翻译交付的多种形式，这一切是由无处不在的计算与双向性所致。能够用智能手机上网，或修改网站内容，这些无论是对数字化在日常生活的嵌入，还是数字化在本质上发生的改变，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探讨了游动的、交互计算的出现对翻译实践的意义，详细描写了翻译生产与接受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形式，以及众包对翻译造成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根本变化就是读写规范的不断改变。如果说翻译形成了特有的对印刷文字的依赖，或者说尊崇，当文字由纸张跃上屏幕后，将会引发怎样的变化呢？本章讨论了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个后印刷的翻译读写时代，以及翻译生产和使用方式改变可能带来的后果。把翻译实践产生的变化视为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这种做法回避了技术的本质。在探讨崛起的信息科学以及“可转换性”这一数字化的核心问题时，本章提出信息是翻译的一个子集，把当今时代描绘成翻译时代而非信息时代更为准确。作为一种描述翻译时代特殊种类实践的方法，本章重拾透明度这一概念，但此处是为了分析可辨识实践的影响。通过伦理透明度、表象透明度和刑罚透明度这三种不同的透明度，本章从方方面面（从民族身份的构建到间谍活动）揭示出翻译与数字化的命运如何紧密交织在一起。

第5章探讨了我們如何应对数字化时代中翻译所采取的新形式。这一章

以机器翻译理论家与实践者马丁·凯伊¹对数字化时代翻译进行的开创性反思为引子,探讨“规模”思维和“精细”思维这两种翻译思维方式如何有助于在自动与半自动化时代定位特殊类型的翻译实践。细节在翻译实践中的战略重要性被置入日益兴盛的要点或指示性翻译中。我们认为,隐藏在“规模”与“精细”两种思维模式背后的是对待普遍性问题的两种不同方法。简单普遍性与复杂普遍性之间的张力与权力和影响的介入交织在一起,翻译深陷其中。为了揭示翻译思维和实践的复杂普遍性含义,我们对比了“差距”与“差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差距”避免了典型性的具体化趋势,而这往往是“差异”的符咒。相对于身份的颂扬,“差距”更加青睐衍生力的培养。基于这一观点,译者关注语言与文化的目的与其说在于价值,不如说在于资源。“差距”可能存在的地方显然就是无尽猜想的源泉。但是,在数字化时代的翻译实践中,一个可以关注的领域就是关于质量以及译后编辑适当性与否的讨论。紧接着,这些讨论可以置入一个围绕数字人文主义的新兴话语体系。随着数字化工具的出现,数字人文主义试图去理解现代文化和社会发生的根本变化。这是一个批判性反思运动,而不是宣扬网络的路演。在这一显现行动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文献学视角,即在数字世界中深入探讨语言与实践的意义与历史。本章还借助伊凡·伊里奇²对联欢工具的追求,一种激发而非阻碍人类发展的工具,思考如何利用文献学视角来反思翻译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阻碍这一发展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共识人文主义的特殊版本,这种版本利用特殊的文化经历,掩盖剥削性的权力关系。本章提出一个思考人类社区中翻译的方法,展现了冲突的永恒性以及构造而非臆断社区的必要性。通过一个新的框架,本章还描述了翻译对构建社区的贡献;这一框架挑战了传统的、系谱性的呈现预设文化特质的做法,并指出:对陌生人群体的动态颠覆是具有自知意识的翻译实践在数字化时代最为激进的允诺。

在索玛亚·拉马丹的小说《水仙花叶》中,叙事者面对生活中特定时刻的困难抉择时,和安德烈·阿加西一样有一种不确定感。这位埃及小说家抓住了萦绕一切变化的那种不可知性,“开始,成为开始,变化不停,每

1 Martin Kay, 1935-, 美国斯坦福大学语言学教授,曾任计算语言学会主席、国际计算语言学委员会主席,国际计算语言学界领军人物。

2 Ivan Illich, 1926-2002, 一位集神学、哲学、社会学及历史学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学者。

次都变”(Ramadan 2002: 4)。这句话道出了任何一种试图描述变革的危险, 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开始不断发生变化, 似乎永远都无法摆脱事件造成的手足无措。但是, 危险不能成为放弃的借口。在当今时代, 任何思考翻译的尝试都必须关注翻译生产与接受环境的巨变, 这一点至关重要。

当新技术逐步形成后, 它们就会赋予旧概念新的生命。在不断增加的有关网络文献中, 一个被重新引入、用来描述网络本质的概念就是“心智层”(Blondeau and Allard 2007)。这一概念最先由法国思想家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提出。在很多人看来, 互联网就是这一“心智层”的具体化。一个可以在瞬间接入, 包含不断增加的、链接更多信息的全球信息库的存在意味着, 我们不能从区域角度来看待互联网, 而应当把它视为一种超验的心智层, 包含人类的集体智慧 (Vanbremeersch 2009: 22)。抛开数字现象中任一特性描述中不可避免的夸张系数, 我们终不能摆脱无处不在的数字资源以及了解这一星球上众多居民日常生活的方式。翻译工作实践发生的变化完全超出了想象, 译者可以从互联网这一基础设施中得到多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当然, 挑战在于如何把翻译置入显现的心智层中, 以及未来如何在数字空间发生的语言、文化与社会重构中为其定位。

与其他领域一样, 数字领域也深受政治的影响。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应用被广泛评议。值得关注的是, 当分析家们开始思考事件的内涵时, 他们开始转向翻译, 把它作为一种阐释的框架 (Mehrez 2012)。在数字化时代中, 翻译的政治经济明显涉及以下几点: 哪些人得到数字信息? 需要哪些条件? 哪些信息得到翻译? 为谁翻译? 通过何种媒介? 在另一个层面, 数字媒体潜在的即时性与可触及性意味着翻译流量不断加快, 并且暗含颠覆性效果; 但与此同时, 译文的广泛传播让异域政体与文化形象被本地接受, 成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议程。这一新的数字秩序中还有一点不容忽视, 那就是数百万陷入“翻译地带”的移民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在新语言中生活的同时, 他们通过数字工具与出生地母语保持不间断的互动。翻译塑造了工具, 也深受工具影响。在历史或当前任何一种试图理解翻译与工具之间关系的过程中, 经济与政治因素都不可避免地显现。我们还有不少困惑, 但作为探索的前奏, 困惑并非不光彩的状态。如果开始在不停改变, 那么最好的开始莫不是变化?

目 录

致 谢	iii
要 点	iv
引 言	v
第1章 翻译族史	1
1.1 工具	2
1.2 蕴涵	4
1.3 接近	7
1.4 贸易	10
1.5 控制	13
1.6 媒介	17
1.7 想像社区	21
1.8 差异性	30
第2章 清楚表达	34
2.1 通用语	35
2.2 清楚表达	38
2.3 成本	41
2.4 去中介化	43
2.5 科学	45
2.6 及物性	47
2.7 透明度	54
2.8 权力	59
第3章 翻译限度	64
3.1 救世理论	65
3.2 翻译与限度	67
3.3 广延文化与精细文化	71

3.4 增长限度	75
3.5 同一性	78
3.6 翻译与读者的增加	80
3.7 可变性	90
第4章 普适计算	94
4.1 批量供应	94
4.2 对话	100
4.3 普适计算	102
4.4 维基翻译	104
4.5 信息	107
4.6 普遍化	111
4.7 透明度	112
第5章 细节	122
5.1 细节	122
5.2 差距	128
5.3 质量	134
5.4 数字人文主义	137
5.5 联欢性	140
5.6 共识主义	145
5.7 再生	146
参考文献	151
译 后	169

第1章

翻译族史

12世纪时，来自巴斯¹的学者与翻译家阿德拉德²在《星盘的使用》一书引言中，给他的赞助人亨利王子（后来的国王亨利二世）提出了如下建议：

无论是谁，如果住在一间房子里，却对房子的材料和构造、数量和质量、位置和特性一无所知，那他根本就不配住在里面。同样，如果一个人在宫殿里出生并长大，当他长到能够辨别是非的年龄³后却仍不理解宫殿为何如此华美，那他也不配住在里面；如果有可能，他应该被逐出。（Lyons 2010: 128-129）

阿德拉德教导年轻的学生如何使用星盘。这一工具将会彻底改变西方基督教旅行者的命运。阿德拉德的这部著作是他多年翻译阿拉伯文献的硕果，展示了阿拉伯人在技术上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阿德拉德在文中选用的比喻都和建筑有关，比如“房子”“宫殿”“材料”“构造”等。换句话说，在推广新兴的航海技术时，阿德拉德在语言上借用了一种已知技术——建筑术，为人们提供“庇护”的房子或宫殿。在阿德拉德看来，

1 Bath，位于英格兰埃文郡东部。公元1世纪，入侵的罗马人在当地发现温泉后，建立了宫殿式的浴池。

2 Aderlard of Bath，约1116-1142，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最早把阿拉伯文献译成拉丁文的翻译家之一。

3 age of discretion，能辨别是非的年龄，英、美法律定为满14岁。

人们只有在知道了世界运转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理解，而知识离开人工制品的语言也难以表达。阿德拉德翻译的成就在于改变了读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但这一成就并非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引领读者去使用和理解新工具来实现。只有通过人工制品才能理解人类存在，这些物品是人类存在的最好注解。

1.1 工具

那么，工具为什么对我们理解“人之为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对我们理解翻译又能带来哪些启示？考古学家蒂莫西·泰勒¹指出，有很多理由可以表明人类本不该存在：

由于头骨太大，我们在争取降生的那一刻就冒着被卡住或窒息的危险。在一支技术团队的帮助下——包括产科医生、助产士和一大堆哗哗作响的机器，笨重的头骨好不容易才挤出来初见光明，紧接着出来的是远不及其他哺乳动物的弱小身躯，大声啼哭，没有毛发，柔弱的身体在接下来几个月内都无法支撑起自己的脑袋。这样一个连基本的繁殖都会轻易丧命、一个需要成人多年照顾后才能自己穿衣服的物种，究竟是如何进化并最终成为地球上的优势物种呢？(Taylor 2010: 4)

人类不仅变成了地球上的优势物种，还栖息在可以想象到的各种环境中，从高原到海底（不管多么短暂）。这些弱视、脊骨脆弱、幼儿期不能自立的动物王国成员们，究竟是如何获得并占据如此优势的呢？答案之一在于泰勒所说的“第三系统”。根据泰勒的定义，第一系统由物理和非生物的化学系统构成，第二系统是生物系统，而第三系统则指由人类发明、塑造的一系列实物 (ibid., 4-6)。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进化包含了生物和文化两个层面。当我们拥有了火、工具、武器和衣服，就不再需要巨大的牙齿、爪子或肌肉，也不再需要很长的、用来消化蔬菜的肠道。这就使得

1 Timothy Taylor, 1960-, 英国考古学家，专注于史前考古研究，现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人类史前史教授。